

ZHONGGUOSHIMINSHEHUILUNGAO

ZHONGGUOSHIMINSHEHUILUNGAO

ZHONGGUOSHIMINSHEHUILUNGAO

中国市民社会论稿

高兆明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市民社会论稿

高兆明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晓玲 斯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市民社会论稿/高兆明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8

ISBN 7-81070-360-9

I. 中… II. 高… III. 市民—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480 号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徐州 邮政编码 221008)

出版人 解京选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53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哲学与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1)
二、历史规律、价值选择与社会进步	(6)
三、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	(13)
四、“市民社会”理念与研究进路	(17)
第一章 公民：从身份到契约	(26)
一、市民	(27)
1. 臣民、市民、公民	(28)
2. 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方式	(41)
3. 差别与欠缺	(46)
二、自由权利	(55)
1. 存在的自由	(55)
2. 劳动交换	(65)
3. 契约平等	(80)
三、自由意志	(88)
1. 自主：意志的个别性与普遍性	(89)
2. 自立：财富与道德	(94)
3. 自制：市场规范与理性累进	(98)
第二章 国家：从人治到法治	(104)
一、法治与法制	(105)
1. 宗法“政”“治”发微	(105)
2. 民主之政道	(115)
3. 法治与法制	(129)
4. 科层民主制与权力腐败	(136)
二、秩序与效率	(145)
1. 秩序	(146)

2. 效率	(155)
三、公正	(166)
1. 公平与效率	(166)
2. 自由与平等	(175)
四、道德理想与市俗国家	(189)
1. 市俗国家建立的两种途径	(190)
2. 国家“合法性”与善	(198)
3. 法统与道统	(201)
第三章 社会:从封闭一元到开放多元	(205)
一、社会交往	(206)
1. “社会交往”理念	(206)
2. 交互主体与交往共同体	(213)
3.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225)
二、社会结构(1)	(231)
1. “社会结构转型”理念	(232)
2. 开放与多元	(234)
3. 利益集团	(238)
4. 边缘群体与核心群体	(246)
三、社会结构(2)	(249)
1. 自然人与法人	(249)
2. 单子与骰子	(256)
3. 角色与反角色化	(263)
四、社会价值精神	(271)
1. 目的性与工具性	(273)
2. 民主与宽容	(279)
3. 社会善与个体善	(288)
4. 别儒开新:新价值精神的孕生	(294)
后记	(300)

导言

一、哲学与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入口处，我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又感到历史的沉负。我们应当从历史承接什么、弘扬什么，又应当为历史做些什么？我们应当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后代，无愧于历史所赐予的机遇。生活的喧嚣、尘世的繁杂，确使一些人犹豫、迷惘、平庸、沉沦乃至堕落，但是却不会使人类沉沦与堕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类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作为自己的良心与脊梁，不甘平庸与沉沦，生命不息，追求不已。他们是人类的希望。在新时代的入口处，既需要千百万民众艰苦卓绝的斗争，更需要冷静的头脑与神圣的良心。

我们这个民族久经折难、饱经风霜，在一路坎坷、一路折难中逐渐醒来。历史证明没有什么救世主，真正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真正的拯救是自我拯救。路在自己的脚下，人类就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然而，历史又

不是可以随意涂鸦的画布,也不是可以任意的试验场,轻率历史就是轻率自己。若果真那样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没有现成的路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有古往今来诸多思想家的深邃洞见、古今中外丰富的经验教训,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道路与普遍规律。因此,我们并不是漫无目标、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并不完全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劈道路的先行者。我们最需要的是在前进过程的不断反思。反思不是纯粹的思辨与空想。反思是哲学的批判,是领悟历史、直面现实、借鉴经验、汲取教训、面向未来的分析批判。反思是真正的思想。如果说行动需要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反思。行动真正需要的是反思。离开反思的行动则堕落为鲁莽与任性。改革、发展、前进需要反思。

哲学是对形而上的沉思,因而,它又是以形而下为其前提的,对形而上的关注,实质上是对形而下本质内容的关注。离开存在、历史,现实的哲学充其量只是空洞的玄思,没有生命力。它可以成为一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工具,但却于事无补。严格地讲,社会、历史不需要这种哲学,它们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哲学传统,尽管它存有深深的缺憾,值得深刻批判,但是,它已成为民族之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它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及其历史,更何况它还是人类珍贵的文明财富。我们这个民族也曾饱尝过形而上学哲学的苦果,形而上学哲学几乎毁灭了这个民族。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于历史教训的刻骨铭心,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于传统的极端批判,或者是由于哲学没有为变革提供积极的指导,至少目前哲学为人们所不屑一顾,这既是哲学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难道真的被黑格尔所言中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民族产生伟大的精神,哲学是

“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

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因此,哲学又绝对不是可以简单拿来为现实辩护的工具,这正是恩格斯在高度赞扬黑格尔那关于现实与存在的极思辨命题时所揭示的思想。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具有某种永恒的魅力,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那巨大的历史感与深刻的批判性,尤其是《精神现象学》这部最晦涩、最思辨的著作,其历史感也最强。任何一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哲学思想家,他们是以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而影响时代与后人的。哲学属于它的时代,不过,不能据此就断言哲学总是落后于时代。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认为哲学总是落后于现实的,“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它只能把“灰色描绘成灰色”,所以,“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因而,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对现实的阐释而不是批判,是辩护而不是剖析^②。对此,恩格斯称之为“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黑格尔哲学也因之难免其强烈的保守性。其实,哲学作为对历史的思想把握确实存在着落后于现实的一面,但是,它又同时存在着超越的一面,这不仅表现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诸如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一基本事实,还表现为当今时代人们对存在、生命、价值等关系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人类哲学问题的强烈关注这一基本事实。一种深刻理性的哲学将对历史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预见、指导、推动作用,它将能使人类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曲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社会历史的较大发展。当代中国是求发展还是求增长,是求公正还是求效率?当代人类是求和平还是求冲突,是取“和谐”还是取“偏枉”?当代中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② “不可能把国家从其应该怎样的角度来教,而是在于说明对国家这一伦理世界应该怎样来认识。”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国的社会结构体系应当怎样,如何构建?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存在的哲学理解及其价值取向,而这种理解与取向又直接制约了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状况。哲学奏响一个时代开始的主旋律,完整的乐章则出现于一个现实过程完成之时。哲学是一只终日不知疲倦的鹰。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任务重重。在现象界是国家的繁荣强大、社会的安定祥和、民众的安居乐业、国民的众志成城,然在现象界之背后存在的实则是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健康的民众生活哲学。正如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的那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没有可以凝聚人心的价值取向,则这个民族、国家犹如浮土飞沙,无根无砥,没有希望。不过,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有事实上存在的、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一是这种价值取向是否真实合理。严格地讲,一个社会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地总是存在着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这可以是民众自发拥有的,也可以是被有意识地灌输引导确立的,民众自发拥有的价值取向良莠杂居,至少是没有经过洗礼陶冶的,因而,一个社会应当具有某种积极的价值引导,且这种引导又应当是真实合理陶冶式的。问题不仅如此,一个社会的政府也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事实上进行自己的价值引导,没有不进行价值引导的社会及其政府。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社会价值取向引导的真实合理性。一个真实合理的价值取向不仅是有利人性生长、人心凝聚、健康向上的,而且也是有深厚民众生活哲学基础的,民众的生活哲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互相补充、互为依赖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当人们在动听的言辞之下各怀鬼胎、巧取豪夺且又能得逞时,则崇高理想与壮志豪情就会沦为肮脏的遮羞布,更多的人们就会对本是纯洁崇高的东西变得不屑一顾,社会在滋养极“左”思潮的同时又会流行玩世不恭。当民众中弥漫着浓郁的冷漠、疏离、自私、逐利之气息,充斥着“孔方兄”、“末日”生活哲学时,则社会宏观

健康合理的价值引导尤为艰难。当社会事实上倡导的价值取向是金钱与权力时,则民众中难以形成普遍高尚的心志与优美的情趣。民众的情趣中孕育与存在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家政府与民众德性生长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与罗尔斯又均有其合理性——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落后的民众没有落后的政府,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这一方,而在罗尔斯看来民众善的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公正环境的存在,社会公正先于个体德性。他们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各自均仅立足于问题的一个方面,仅抓住问题的一个角度,二者均陷于某种片面又均拥有某种真理性。这样看来,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似乎有着比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

经济现代化是当代中国迫在眉睫的大事,没有经济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不过,就涉及中国未来的关键问题而言,尚存在一些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的因素,诸如民众们学会做真正的公民的问题,人们对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的关切问题等。如果说我们有存在的危机的话,那么这个危机不仅是经济的更是存在的价值的。虽然我们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自觉地从封建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虽然我们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却越来越失去对某种永恒的兴趣,变得那么实利乃至市侩,随波逐流、盲目信从、崇拜金权,沉迷于灯红酒绿、倩女美色、轻歌漫舞之中,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古罗马帝国曾辉煌过数百年,但九百年江山如朽木顿折。其成在崇尚朴实、不事奢侈、清廉淳厚的罗马古风,其毁在奢糜腐化、醉生梦死的风尚。民族精神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成败盛兴、生死存亡。康德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人们所敬畏惊叹的只有头上的浩瀚星空、心中的神圣道德。头上的星空代表着自然与感觉世界,我们从对星空的感知中感觉到人类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并通过这浩瀚的星空将自己融入那层层叠叠无垠之空间、绵延不绝无始无终之时间,我们

属于自然宇宙永恒运动的一个暂时存在。心中的道德代表着自由与理性世界，她使我们于有形之中体悟到无形之人格，使我们于有形之无限中体悟到无形之无限。在有形世界中，我们人类与诸多存在一样只不过是物的存在，受自然必然性所支配，但人类同时还是理性的存在，人可以为自己立法，道德法则的自律性使人感觉到人格及其意义，感受到人的尊严与自由，使人有可能从自然中超脱出来，以人的方式存在并寻求人的真正幸福。无论是对自然的敬畏还是对道德的敬畏，都与人类对存在方式的意识息息相关。对自身存在方式的反思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民族精神是当前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民族精神的振兴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前题。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有现代化的社会精神。

二、历史规律、价值选择与社会进步

社会发展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合乎历史规律。在人们这种共识中包含了一个基本前提：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然而，正是在人们的这个习以为常的认识中却包含着大相径庭的内容。依据于对唯物史观这一内容的不同理解，可以得出宿命论的结论，也可以得出主体论的结论。如果说历史规律不包含人的现实活动，那么人的一切现实活动就将是毫无意义的，至多不过是那神秘安排的现象或显现；如果说历史规律并不外在于人的现实活动，它只不过是人活动的规律，那么历史就是人自觉能动的历史，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

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这不仅是个信念，更是对宇宙存在的深刻识见。宇宙自然是有规律的，作为宇宙自然中一部分的人类历史也自然是有其客观规律或必然性的，不过，这个规律如同任何规律一样都只是那具体存在的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既不是超越于万物之上、游荡于冥冥天国的宇宙之主宰，也不是先定地存在并寻找机会跳出来施展魔力的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它只能被理解为是

人的活动的规律,它滋生于并存在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只有这种理解才既符合事物的本性又具有革命性,才能逻辑地于当今时代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问题,才能必然地提出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问题。卡尔·波普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虽然有许多地方我们不能苟同,但是,中肯地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其实波普的真实本意并不是要否认必然性或历史的规律性,他矛头所指的是历史宿命论,他是要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融汇进主体性、主动性,是要在对历史规律作用的理解中破除机械论代之以辩证法^①。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波普的这个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吻合的^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尖锐地批判过那种以宇宙目的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观点,并明确指出下述观点是“泛神论”,这种观点把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看作“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③。离开人的创造性活动而奢谈历史规律,在本质上跳不出泛神论或宿命论的窠穴。因而,对于“社会规律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这一人们所熟知的命题,就应当重新审视,严格地说这个命题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④。

对历史规律的主体性理解所带来的一个不可回避之问题就是

① 参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②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规律只不过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页。

④ 参见高兆明:《论社会发展中的自觉选择》,《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排斥历史活动的主体性。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就在于人们实践及其在实践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就在于社会规律所揭示的社会宏观自组织过程的客观性。这里有必要理清“客观”范畴。通常总是将“客观”等同于“物质”、“存在”,其实,这是误解。“客观”是与“主观”相对应的范畴,“物质”是与“精神”相对应的范畴。“客观”与“物质”都是“存在”的。“客观”是认识论领域的范畴,“物质”是本体论领域的范畴,“客观”指非认识主体思想之虚构存在,即相对于认识主体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认识对象,这认识对象不依认识主体是否认识或认识态度而转移。作为认识对象既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如果承认心理学是门科学,那么就应当承认心理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现象的客观存在,如果心理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无法加以研究、无法成为科学。

规律的本质是必然,主体性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并不逸脱于必然之外,但是自由又不简单的等同于必然。斯宾诺莎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缺少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运用,这昭示了自由的精髓,但这种认识必须被进一步深化。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存在的自由,使得在原初纯粹宇宙自然必然性意义上的必然获得分化,分化为“存在的必然”与“价值的必然”。存在的必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必然,是一种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的纯粹客观的必然,用黑格尔的话说是自在的必然。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其实就是指的对存在的必然或自在的必然的认识,只有这种必然或规律才是事物的本性,只有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认识才有可能合乎事物的本性,这里凸现的是规律、必然本身价值的中立性与客观性。能否客观、全面地认识这种必然,是人们行为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前提之一,认识过程中的客观无嗜好、全面无偏差,是对于行为主体的最基本要求。存在的必然是抽象的或如黑格尔所说是实体的必然。在社会历史领域,

实体就是主体,因而,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就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的必然,而且还是主体性的价值的必然(严格地说,从实践、主体的角度来看,任何宇宙自然的必然都既是存在的必然又是价值的必然)。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观与真理观、价值观的统一,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历史观与真理观的统一,以及历史观、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历史观与真理观的统一可以说是存在的必然或是对存在的必然的把握,而历史观、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则是存在的必然与价值的必然的统一。存在的必然是缺乏“意义”的,一旦存在的必然拥有意义,则它就升华为价值的必然。价值的必然并不孤立于存在的必然之外,相反,它植根并存在于存在的必然之中。历史观与真理观、价值观统一的首要内容当然是历史是人的自觉能动创造性活动过程,不过,除此而外,它还应当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对于社会必然的认识固然有一个合乎历史本性的问题,要达乎“真”,不过,在达乎真的同时就伴随有“善”^①与“美”。除了疯子,大凡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必然或规律时,总是在自己所理解的正确的意义上来把握社会历史的必然或规律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人们总是受自己的存在及其条件所限制,总是站在自己存在的立场来理解与把握这种必然与规律的,并且往往总是根据必然或规律的某一方面、某一点来改造或安排历史,而由于存在的实在、历史的出现是诸多必然、规律系统作用的综合结果,因而就不得不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这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悲剧,这种悲剧与人类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密不可分。价值的必然正是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过程中被人们赋予“善”“美”意义之存在的必然。

价值的必然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存在的必然被人们认识、把握,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于千百年的实践、体悟、理解中,一

① 这里的“善”尚不是严格伦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泛指一般价值要求意义上的。

方面将那些对社会历史起基本作用的规律于意识中升华为信仰，这种信仰使人类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曲折中始终保持作为主体之存在的一贯态度、稳定方向。另一方面，人类又于长期历史经验的锤炼之中，将规律同人类自身存在的真、善、美直接连在一起，使之成为人类应有或理想状态的价值期望，如尊严、人格、正义等，这既是一种主观的信念、人心的取向，也是历史的力量。这种价值必然具有正当、合理要求的意蕴，蕴含其中的是善良必定战胜邪恶、正义必定战胜偏私。

历史发展总是充满选择，选择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未来不是注定的。历史只是给未来提供了大致的趋向，在这种趋向中存有多种可能，或者说社会在现实中孕育着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人的选择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的统一。现实并不是某一可能的充分实现，现实是历史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昨日某些可能的部分实现。没有选择，就没有发展、没有历史。

历史在选择中前进与历史在人的能动实践中发展是同义语，这就不得不涉及历史发展的目的性问题，这里的目的不是在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的近乎神学性质的客观定向展开意义上，而是在主体能动活动的价值指向意义上使用。应当区分“自然目的性”与“社会目的性”或“人的目的性”^①。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反指向自身的^②。选择是对结果以及实现结果的活动过程状态的选择，实质上是对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实现自由解放道路的选择，因而，也是对人性实现以及创造“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马克思语）的选择。一个社会无论怎样选择自己的具体发展道路，都应当以这个社会

① 参见高兆明：《社会变革中的伦理秩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5页。

② 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都是“为我”的最深刻内含，也正是与神学目的论的根本区别。

成员人性健康发展、人民生活自由幸福为最高宗旨。

存在总是不完美的,主体对其存在状态也总是存有不满。历史的发展或者说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总是从对自身及其存在条件不满开始的。“自古以来‘条件’就是这些人们的条件;如果人们不改变自身,而且如果人们即使要改变自身而在旧的条件中又没有‘对本身的不满’,那么这些条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① 选择就是在目的性过程中的比较、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选择是基于一定目的对规律发生作用条件的改变、创造,通过条件的改变来改变规律的作用及其效果。改变存在的条件就是改变人自身,人在使不太不完满的环境变得比较完满的同时,也使不太完满的自身趋于比较完满。改变环境与改变自身是一体两面之事。人们往往总是抱怨环境的丑陋、风气的败坏,希望有合乎人性的公民社会环境以利自身的生长,这种愿望是善良的,不过,人们亦不可忘记自身并不是一个观剧者而是一个剧中人,改变自己的日常行为与日常生活状况,就是改变社会环境的现实活动。我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与主体。选择社会进步,就是选择自身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当马克思在讲人的行为有两个尺度时,事实上就以哲人的睿智揭示了历史的必然与自由、决定与选择的内在统一性。

社会在选择中进步。然而,值得指出的是:a. 一般说来,任一时代的人们最多只能大致实现自己所选择的存在与发展目的,存在的必然及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是难以被完全提供与完全把握的,何况人们的利益往往又会遮碍其洞见、迷混其心智,使必然以一种扭曲了的方式发生作用并给人们以教训。b. 任一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进步的,既有问题的解决只是为新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的出场开辟了道路,人类永远面临着自我于发展中所提出的问题,选择进步就是向自我挑战,害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0页。

新问题或者以新问题为通词而安于现状,既是没有生命力的表现,又不可能杜绝新问题的出现。c. 社会解放、人类进步以人性提升为内容。人性提升的综合标志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这不仅指改变外部自然的劳作能力的增强——这正是现代高科技社会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能力,更是指如同亚里士多德、康德所意指的实践理性生活能力的提高——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实践理性能力并不是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是狭义道德的,而是人之为人的智慧生活能力。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过去决定现在,过去与现在决定将来,这是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其实,将来也决定现在,将来是通过价值目标选择的方式来决定现在的。当社会经济生活处于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处于系统调整之时,这种价值选择所确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格外明显。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选择的方向。当然,人们价值选择、能动实践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并非完全随心所欲,不过,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中,由于人的价值旨趣、目标选择不同,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就可能大不相同。在认识论看来,存在就是价值,它的任务就是对存在本身的解释,而在价值论看来,存在属于价值,人的自主活动才使存在获得价值。人的实践状态不同,存在的价值就不同,现存的事物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就不同。应当把握社会处于结构转型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价值选择对未来的积极作用——当社会处于发展的稳定态时,要达到在结构转型时的同样发展效果,则要花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努力与代价。人们确实不能完全跳出传统的手心,但传统又确实是可以被打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奴仆是因为行为者愿意做或选择了做传统的奴仆。

在历史观、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中鸟瞰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或取向)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这种市民社会不是仅在私域、经济狭义上的,而是包括社会公共生活在内的一种广